

# 日治時期 臺灣衛生史料特展

專輯

從瘴癟之鄉到清淨家園



日治時期  
**臺灣衛生史料特展**

從瘴癟之鄉到清淨家園





## 目錄

館長序	4
壹、導言	7
貳、日治以前臺灣衛生篇	9
一、美麗之島與瘴癟之鄉	10
1·洋人及漢人水土不服	
2·原住民亦成疫病亡魂	
3·醫療與救卹設施	
二、臺灣之飲水衛生	13
三、臺灣之居住環境衛生	19
四、現代西方醫療技術之引進—洋人來臺傳教兼行醫	23
1·馬雅各(Dr. James L. Maxwell, 1836~1921)與新樓醫院	
2·馬偕博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與 馬偕紀念醫院	
3·蘭大衛醫師(Dr. 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與 彰化基督教醫院	
五、衛生大事記	29
參、日治時期臺灣衛生篇	31
一、衛生行政機關	32
二、飲水思源	44
1·滬尾（淡水）水道	
2·基隆水道	
3·下水道	

### 三、防疫

1. 征臺統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死因之謎

2. 重要傳染病之防治

- (一) 霍亂
- (二) 鼠疫
- (三) 天花
- (四) 瘡疾
- (五) 結核病
- (六) 癲病

### 四、市區改正

### 五、醫療行政

- 1. 醫院
- 2. 公醫
- 3. 警察醫
- 4. 甲乙種醫師
- 5. 療養院所

### 六、臺灣醫學教育之創始—總督府醫學校設立

### 七、衛生相關人物

- 1. 後藤新平 (1857~1929) —臺灣衛生環境改善及基礎建設的推手
- 2. 巴爾登 (William K. Burton, 1856~1899) —水道先驅
- 3. 濱野彌四郎 (1869~1932) —「都市的醫生」、水道建設者
- 4. 杜聰明 (1893~1986) —臺灣首位醫學博士及鴉片癮治療研究者

### 八、鴉片政策：臺灣鴉片令、鴉片免許

### 九、衛生大事記

### 十、結語

### 肆、附錄

#### 一、臺灣總督府歷任衛生課長一覽表

58

86

91

114

126

134

140

142

145

146

民政局  
總務部長

農商部  
農業司



## 館長序

西元2003年，臺灣遭逢一場突如其來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大流行，因臺灣不是WHO（世界衛生組織）會員，無法及時掌握疫情資訊，又SARS在當時是一種從未大規模流行過的新型傳染病，其致病原因、傳染途徑、預防方法及患者死亡率等對一般人而言極為陌生，隨疫情不斷爆發報導，瞬間臺灣社會陷入嚴重恐慌，為至今仍無法完全忘懷的一場噩夢。

事隔6年後，當人們對SARS疫情逐漸淡忘之際，今（2009）年4月底，墨西哥傳出H1N1新型流感能疫情而迅速蔓延全球，更讓人人聞疫色變。未來各式變種新型傳染病可能接踵而至，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對如何防疫忐忑不安，以史為鑑，向走過各種疫病幽谷的臺灣先人學習其智慧巧思，或許不失為「鑑往知來」的抗疫良策。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日治時期珍貴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案中記載許多傳染病防疫史事可提供參考，該檔案目前也已全部完成數位化，透過網路傳輸，可以方便讀者查詢、閱覽及複製運用。

臺灣地處亞熱帶，根據相關古籍記載，自古以來即是多瘴癘之地，有關臺灣瘴癘之記載俯拾皆是，例如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卷二便載有「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年)改(指鄭成功)赤崁地方(即今臺南市)為東都。……初至，水土不服，疫病大作，病者十之八九」。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記載，日本統治臺灣的五十餘年間亦曾發生過多次傳染病大流行，死傷者難以計數，臺灣總督府對各種疫情的控制頗有成效，以鼠疫為例，在1918年後便絕跡。根據檔案記載，日本領臺後第一次疫情發

生在1896年4月，先是安平地區發生熱性病流行，同月又發生疑似鼠疫病例，5月在打狗（今高雄）有一自安平歸來之本地人罹患該病，至7月22日後疫情才暫告止息。在同年10月27日，疫病又侵襲臺北，來勢洶洶，經當時日本軍醫界唯一細菌學者岡田國太郎從患者血液中檢驗出鼠疫菌。為遏止鼠疫蔓延，總督府立即成立臨時鼠疫預防委員，實施車站檢疫、開設隔離病院、調查患者、實施清潔法、進行消毒、禁止文娛活動、封鎖交通等手段，直到12月下旬，疫情才在人心惶惶中突然快速平息下來。據統計，臺北地區共有患者180名，死亡者90名；此外，基隆亦有患者2名，斗六、鳳山各有患者1名，均告死亡；臺南縣共有患者74名，死亡者63名。合計該年度鼠疫流行的總患者數為258人，死亡157人，死亡率高達60.85%，此為官方公布的數字，而實際上病患及死亡人數應不只於此，因染病百姓深怕身份曝光會被強制送至隔離病院等死，故常有隱匿病情之事，或將染病致死者偽報成溺斃或自殺，亦有私下埋葬或拋棄屍體情形發生。

今非昔比，以臺灣現今的醫學及公共衛生水準，對付傳統疫病自是不成問題，但防疫工作卻不可鬆懈，如絕跡多年的登革熱，近年來有死灰復燃之趨勢，故無論醫療如何先進、發達，面對未知詭譎多變的新型病毒仍難免有措手不及之處，而先人在防疫措施實有值得借鏡之處。

憶古思今，為重現臺灣因時遞變的衛生及醫療發展概貌，本館特別以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為基礎規劃「日治時期臺灣衛生史料特展」，也希冀藉此推介珍貴史料，並廣為運用。在整個策展過程，全賴本館整理組全體同仁努力以赴，尤以陳惠芳編纂奔走各地徵集相關文物，及



許錫慶研究員撰寫特展解說內容文稿及專輯，在有限的經費預算下，克服萬般困難順利完成此次展覽活動，彼等之辛勞值得肯定。另本次特展承蒙行政院衛生署支持並分攤經費、臺大醫學院協助提供部分珍貴日文圖書史料影像檔，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研究群暨諮詢委員臺大醫院顧問張秀蓉教授針對專輯相關內容提供寶貴意見，民俗文物收藏家李景暘、陳慶芳、郭双富、唐榮源、洪雅昌先生提供眾多寶貴相關文物，謹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值此特展開幕之際，《日治時期臺灣衛生史料特展專輯》亦告同步出版，特綴數語為序，尚期各界不吝指正。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謹序

謝嘉梁

# アリラマのアリ

蚊に刺され  
蚊の発生を防げ  
治療は徹底的に  
目的に

臺新報社發行

## 壹、導言



臺灣地處亞熱帶，自古以來即是多瘴癘之地，古籍上有關臺灣瘴癘之記載俯拾皆是，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卷二載有「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年)改(指鄭成功)赤崁地方(即今臺南市)為東都。……初至，水土不服，疫病大作，病者十之八九」。夏琳《閩海紀要》云：「永曆三十六年(清康熙二十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年)雞籠山(今基隆市及其附近地區)大疫；時值疫氣盛行，汎守官兵死者過半」。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七風土志記載：「水土多瘴，人民易染疾病」。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四祥異記載：「嘉慶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二〇年)夏，大旱。秋、疫。……」。連橫《臺灣通史》卷三記載：「嘉慶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二〇年)……，淡水大旱。秋、疫。……同治五年(西元一八六六年)……，四月，淡水大疫。……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夏，大疫，兵民多死」。直至清末，臺灣的醫療設施並不發達，除有少數由傳教醫師如馬雅各、偕叡理(按：即馬偕)、羅斯爾所開設的醫館外，民眾若染病，所能仰賴者唯草藥及神佛矣。

日本與臺灣之接觸甚早，遠在德川幕府時代便曾遣人來臺探察，唯懾於當時海上強權西班牙及荷蘭之勢力，因而無功而返。及至清末，日本再度興起覬覦臺灣之心，1874年，藉口「牡丹社事件」而興兵犯臺，然臺灣的亞熱帶風土氣候讓進犯日兵吃盡苦頭，由於瘧疾肆虐，淪為異域亡魂之官兵甚眾，日軍再度無功而返。日本明治28年(清光緒21年，西元1895年)，清朝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同年3月，日軍進佔澎湖時，又嘗到霍亂之苦。據載，當時登陸總人員6,194人(包含軍屬、僧侶、新聞記者等)中，罹病者就有1,945人，死亡1,257人。日軍先遣部隊近衛師團第一旅團於同年5月29日從臺灣東北角的澳底登陸，6月19日開始南進。直至同年10月末全臺底定為止，征臺一役中戰死者僅164人，負傷者亦只不過515人，但病死者卻有4,642人，患病者更高達26,094人，其損失可謂慘重之至。



## 貳、日治以前臺灣衛生篇

381

This is a copy of Japanese  
in the project of Taipai.

Sir I respectfully beg  
entrust to your care my  
application for sanction  
concerning to practice as a  
doctor. I enclose the  
application herewith  
Yours most respectfully  
David Landsborough

## 一、美麗之島與瘴癟之鄉

### 1. 洋人及漢人水土不服

臺灣內部有高峻山脈蜿蜒起伏，自難免有風土病之存在。其對住民之不良影響，夙為識者所共認。例如史家羅德偉·里斯（Ludwig Riess）著《臺灣島史》云：往時在本島西南部之荷蘭宣教師等，始終歎息受其風土之苦，且西元1882、3年間，博物學者Guillemard F. H. H. 搭乘英國軍艦Marchesa，巡航中國海上，於登陸臺灣東部之際，留異評謂：「Formosa乃不適宜居住之美麗島也」。不特荷蘭人之觀感如是，日本人亦以水土不服，屢傷健康而死於非命者似為數非鮮，所以日本人會絕跡臺灣，有此一說係因無力抵抗此瘴癟所致。

至於由中國本土移住之漢人，固為先天上富有冒險性之民族，而其當初為求立基於臺灣，須面對諸多自然因素的困擾。至明末鄭成功將克臺灣之際，由根據地廈門、金門等雖獎勵文武百官及兵民攜眷陸續渡臺，但思：「臺地初闢，水土不服，病者即死，故致各島搬眷，俱遷延不前。」之紀錄（《臺灣外記》），可知對於臺灣之行，官民仍極為躊躇。

先是，明代以臺灣為根據，肆行劫掠於海上之漢民海寇，亦似難免屢受此等瘴氣威脅。前此有關林道乾之事，《噶瑪蘭廳志》之〈規制海防附考〉載曰：「蘇澳……相傳自明嘉靖四十二年間，林道乾寇海，曾踞數月；以夥伴病損過多，始行徙去。」之後因有顏思齊，其事蹟如《臺灣外記》所載：「天啟五年九月，顏思齊因往豬羅山（即諸羅山）打圍回來歡飲過度，隨感風寒，自知不起。」蘇澳及諸羅當時全屬番地，尤以苦惡風土為顯著。即以鄭成功本人，力強體壯，復臺僅半載，偶染熱症，八日病革，享年三十九，似於血氣正壯時溘亡。同時，明兵部尚書盧若騰遜跡抵澎湖，未達三日罹病而歿等皆受風土傷害也。盧若騰詠從軍東都民之逸事詩云：「驚聞海東水土惡，征人疾疫十而九」（「殉節篇為烈婦洪和作」等句，係描寫病者即死之情景。又《臺灣外記》載曰：「康熙二十一年（永曆三十六年）三月，出汎雞籠山諸軍士，大發疾病。……越八月，死者過半。」其他《淡水廳志》之〈古蹟志〉曰：「玉山（此所謂玉山係指雪山即次高山也）；在貓裡溪頭山後萬山中，晴霽乃見。巉巖峭拔，疊白如銀，可望不可即。相傳偽鄭自率步卒往至山麓，遙隔一溪，毒甚，涉者多死，遂止。」。蓋在山中平野之臺地通常概未見降雪，眺望同山高峰白雪，以為銀白玉石，進而企圖深入之踏查，竟因瘴氣而得病，死者續出而未達目的，亦屬欲擬臺灣之內山為巒煙瘴霧之誇張餘筆也。

康熙7年，清將施琅所奏〈盡陳海上情形疏〉曰：「原住臺灣者有二、三萬人（指漢民移住者），……此數年彼處不服水土病故及傷亡者五、六千」等語。此數目非僅專舉出病故者，且數字上雖難免有誇張者，假定對二萬住民有五千人之死亡率，則其死亡率等於百分之二十五，假若對於住民三萬有死亡六千人，則可知其死亡率達百分之二十。以此可得證明當時之漢民，受水土不服之影響其人命損失有多大矣。

在清廷統治臺灣時的康熙36年，以採礦之目的來臺灣，踏勘臺灣北部平埔番之郁永河撰《裨海紀遊》，載有其自府治（即臺南）出發，將縱斷西海岸平野北行之際，當時之臺灣知府靳治揚及海防同治齊體物等曰：「君不聞雞籠、淡水水土之惡乎？人至即病，病輒死。凡吏役聞雞籠、淡水之遣，皆歔歎悲嘆，如使絕域；水師例春秋更戍以得生還為幸，彼健兒吏役且然，君奚堪此？」又參軍尹復及鳳山縣典史戚嘉燦等亦曰：「客秋朱友龍謀不軌，總戎……命某弁率百人下淡水，纔兩月，無一人還者；下淡水且然，況雞籠、淡水，遠惡尤甚者乎？」又曰縣役某與其侶四人往，僅以身返，此皆近事，君胡不自愛耶？」等，均記述勸告郁永河中止北行，（附載有：「余笑曰：「吾生有命，蒼蒼者主之，水土其如余何？余計之審矣，不可以不往。」尹復商與守備沈長祿為余作丸散藥，及解毒辟癘諸方為贈，珍重再三。」此亦可知，臺灣內部旅行曾被視為畏途，及珍重解毒辟癘諸藥方等情況。）嗣敘述在其根據地（即臺北平野）果然受困瘴癘，云：「人言此地水土害人，染疾多殆，臺郡諸公言之審矣。余初末之信，居無何，奴子病矣！諸給役者十且病九矣！乃至庖人亦病，執爨無人。……余一榻之側，病者環繞，但聞呻吟與寒噤聲，若唱和不輟，恨無越人術，安得遍藥之？乃以一舶悉歸之。……以余觀之：山川不殊中土，鬼物未見晦蔽，人跡無幾，瘴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即病，千人一症，理固然也。」又敘述其停留五箇月期間，一行五十五人其中有二十餘名之輕重病者實例（如同書記敘，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共四日間之事有：「七月望，炎暑漸退，新涼襲人。其明日有三人忽稱病，十七日，病者又五人，十八日悉不起，爨煙遽絕。」（節略）等，有殊使人一讀淒然之感。），更有敘述淡水港口之情形曰：「惟安平水師撥兵十人，率半歲一更，而水師弁卒，又視為畏途，扁舟至社，信宿即返。十五、六年城中無戍兵之跡矣！歲久荒蕪，入者輒死，為鬼為毒，人無由知，汛守之設，特虛名耳。」而康熙六十年（西元一七二一年）因臺灣瘴癘流行，從征將士因染疫而亡故者甚多，參將林政、王萬化、游擊許華先後病歿。

光緒11年（西元1885年）中法戰爭之際，法國水師提督孤拔（S.Courbet）於6月11日在澎湖媽宮港罹患時疫，終成不歸之客。孤拔將軍為清光緒11年中法海戰時，法國遠東艦隊的中將司令，負責率領大軍到遠東區從事殖民侵略任務。光緒11年2月13日，孤拔親乘軍艦「拜亞德號」，率領四艘戰艦，及法軍1,500人，由基隆轉攻澎湖。當時澎湖已有海防設施，所以當孤拔的軍隊在外海停泊時，清軍即發砲攻擊，孤拔大怒，當夜即搶灘登陸，次日清晨，全軍由風櫃登陸，經三天三夜激戰，清軍不敵，澎湖終於淪陷。同年5月，清法議和，法軍撤兵。惟法軍已所剩無幾，孤拔在憤怒和疾病交攻之下，病逝於媽宮城，留下現存的一方紀念碑，聊供後人憑弔。

## 2. 原住民亦成疫病亡魂

據傳鄭成功率部隊至臺灣南端琅橋時，「高揭帥旗，其旗尾因風招展，所指處則該社土蕃盡瘟疫而死，不待討伐。」另《臺海使槎錄》所收《番俗六考》之〈北路諸羅番（七）〉附載：「盧麻產社（大口根堡鹿麻產庄）今無番，皆民居；康熙五十六年，瘴癘死亡甚衆，遂徙居於阿拔泉社。」

又有阿里山鄒族傳染天花一事，據鄒族牧師鄭信得所述：「吳鳳死了之後，這個地方山美村有一段時間就是感染天花，有族人開始說，可能是吳鳳的靈魂要回來報復。」山美村也因天花傳染而導致人口銳減，族人勢力大為衰頹。上述可能是因為漢人與原住民接觸，帶來各種傳染病，造成缺乏醫療設施的原住民大批死亡。

## 3. 醫療與救護設施

在鄭成功驅走荷蘭人，以臺灣為反清復明的基地之前，已有明太僕寺卿沈光文在1652年因颶風漂流而抵荷據的臺灣，他在目加留灣社教書，並以醫藥活人，顯係懂得醫道的一名儒醫。

臺灣一地雖有極少數儒醫，但缺乏一般良醫，如吳子光所著《一肚皮集》謂：「臺俗浮夸，借濟人利物之名以售其飲羊登壘之計，至交通市肆，真膺混淆，為庸醫所誤殺者歲不下數十百人，而醫道因之不振。」（〈先伯父態生公家傳〉）等，有其事實根據。繼而如《廈門志》〈風俗記〉所云：「疾病……皆不重醫而重神」等情弊，係亦在臺灣形成之通弊。定期舉行建醮送瘟之儀式，可察出係完全賴神力之一斑。

古來由中國本土差遣前來之文武官員兵弁等，往往難免有欲迴避此瘴鄉之傾向。於是，光緒12年臺灣巡撫劉銘傳特於臺北府試院內設置官醫局，廷聘西醫韓森（Hunsen）任醫員，以為文武官員疾病診療所，又附設養病院於各營務處，專為供用兵弁等休養治療。（先是，同治13年至光緒元年間之番界南、中、北開路之際，由於從事諸軍罹患瘴癟者夥多，乃於各營設置官藥局以救急，其情形即如何激之《臺灣雜詠》云：「廣合丸丹僻瘴煙」，附註謂：「各營設官藥局，並施丸散膏丹」。後來之養病院乃係擴張之制度。）明末年間，漢民始移住臺灣之際，盛行建以保生大帝（即吳真人）為主神之廟宇等，乃鑒於傳承大帝治疾有奇效，亦出於適應水土之需要而引發之自然信仰，特別對於痘疹神（痘瘡神）信仰殊深，是有其原因的。

清代治臺灣約二百年期間，先後在各廳縣設立養濟院七處及留養局等，以救濟貧病無依者，包括臺灣縣養濟院（1684年，臺灣知縣沈朝聘設於縣治之鎮北坊，即今臺南市）、鳳山縣養濟院（1684年，知縣楊芳聲設於縣轄土鳳埕）、諸羅縣養濟院（1684年，諸羅知縣季麒光設於縣轄善化里東堡）、彰化縣養濟院（1736年，彰化縣知縣秦士望設於東門外八卦山下，又稱癩病營）、臺北養濟院（1879年，臺北知府陳星聚設於臺北府治之艋舺）、新竹養濟院（1880年，臺北知府陳星聚設於新竹縣治北門外水田尾）以及澎湖養濟院（1881年，在媽宮城育嬰堂由民營改為官營時附設於該育嬰堂而成），其中彰化縣養濟院專門收容癩瘋病患。因救貧通常兼及養老、醫療，故當時醫療僅是附設於清治時期的社會慈善機構。至於民間的醫療體系，亦是貧乏不振而難收功效。

## 二、臺灣之飲水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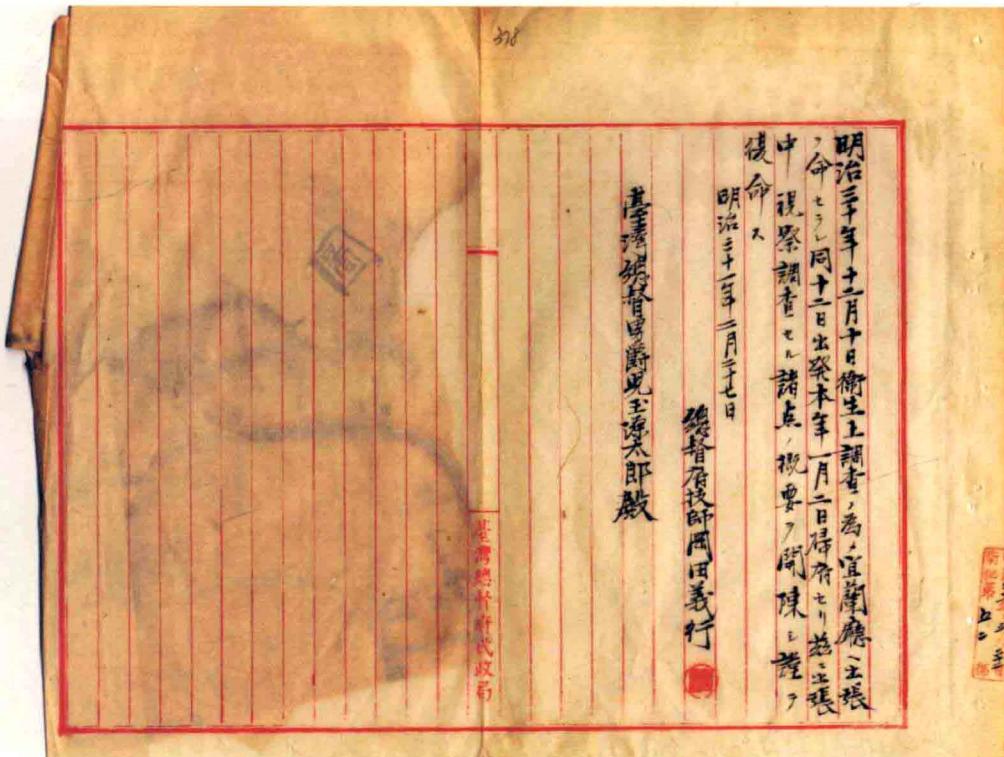
在清治時期，臺民多以井水、河水、池塘水或山澗水作為飲用水，其飲用水質概為不良，對健康造成妨礙。據康熙五十四年間，在臺灣從事測繪臺灣輿圖之法國人馮秉正（印馬俠，Mailla）所撰之踏察記，載云：「臺灣本島雖於實際上名符其實為美麗島之名稱，唯一之缺點是飲用水不良情事，誰人亦無異論。新來之移民，甚為此有毒之水所煩惱。而覺困擾，則因無良法使之改善。曾有南方之臺灣知縣令其僕役加入余隨行隊中，體質亦頗健強，但因飲用水質不良之生水而中毒，服盡方劑仍無效驗，發病五日終至死亡。但由於在首府之清水，生飲之無害，而地方官為余等一行，特用車載運首都之水供用。如位於本島西南鳳山縣距一里餘之地，在山麓發源一泉水，其水流成小溪，白濁帶澀

味，時見其發出有毒臭氣，到底非人所能忍耐。」（據Campbell撰《荷蘭統治下之臺灣》所載 “De Mailla’s motes on his Visit to Formosa in A.P.1715” 等，以此記事可知其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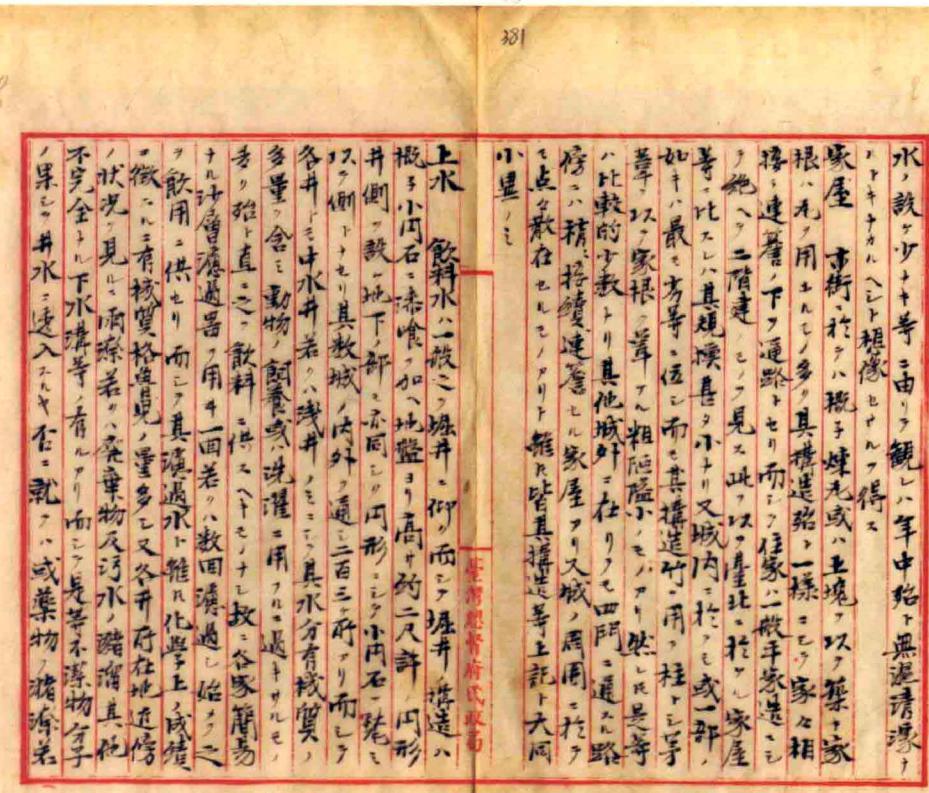
另《諸羅縣志》記述關於該縣城內之古蹟紅毛井一事云：「開自荷蘭，因以名。方廣六尺，深二丈許；泉甘冽於他井。相傳居民若飲是井，則不犯疫癘。」（〈雜記志古蹟〉）更早的還有下記事例，如《重修鳳山縣志》〈雜誌名蹟〉載云：「龍目井在竹仔寮，為小竹橋、觀音山二莊交界。兩井相連，狀若龍目，故名。其泉清冽，相傳飲之可以癒疴。」既而光緒二年，於基隆廳下之基隆港外獅球嶺庄，有公設砌井之事。（在同地自然岩石表面，有彫刻示碑曰：「濟安輪船游府呂，永保輪船都閩府林示。照得：該處水井，經本府捐貲砌成，以便汲取，該民人等務須按照次第，毋得恃強爭先，特示。光緒二年十一月 日立」）

光緒11年決定臺灣建省後，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聘請日人在臺北府前街至文武廟街一帶嘗試開鑿深井，後又聘請洋人繼續鑿井，並於光緒14、5年間在省會之臺北開鑿深井六口，其中三口在巡撫衙門內，另三口在北門街（今衡陽路）、西門街（今博愛路）、石坊街，除提供官衙人員使用外亦供一般民眾取水，可謂臺北公共給水之開始。

清治末期至日治初期，臺灣百姓飲用之井水水質不佳，依《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所載，總督府技師岡田義行在明治31年（1898年）奉派赴宜蘭廳進行衛生調查，在其復命書中記載水井多為淺井，含有多量有機雜質，僅適合當作動物飲水或供洗濯，由他所做的宜蘭城內及大礁溪川的水質檢查報告便可資佐證。



000045430310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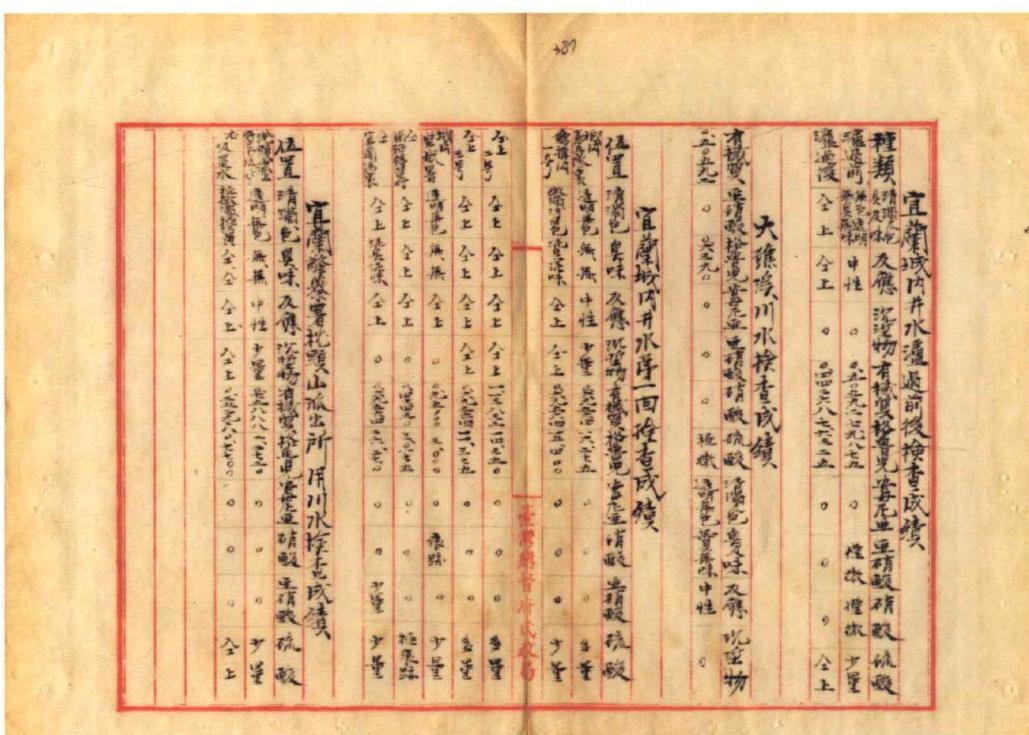


000045430310378

&lt;明治31年岡田義行赴宜蘭進行衛生調查檔案，00004543031&gt;



000045430310379



000045430310384

(明治31年岡田義行赴宜蘭進行衛生調查檔案，00004543031)